

杜威对于传统哲学的分析和改造

陈亚军

(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导 南京 210093)

摘要:杜威对于西方传统哲学的批判在西方哲学史上独树一帜。他从历史学 - 社会心理学的角度分析了传统哲学的起源,认为哲学并非起源于人类认知世界的需要,哲学的起源在于生活。受培根、达尔文的影响,杜威对传统哲学进行了改造,以经验、变化取代了超验、绝对,以关注生活取代了关注物自体。杜威的思路和孔德有相近之处,但在根本上,即如何解释“经验”上他与孔德有着本质的区别。

关键词:杜威;传统哲学;改造

中图分类号: B 712.5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1 - 8263(2004)08 - 0017 - 06

一、生活先于认识

对于传统哲学的批判是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西方许多哲学流派的共同呼声,不论是实用主义还是盛行一时的实证主义,都把批判传统哲学当作自己哲学的主要任务。和逻辑实证主义一样,杜威拒绝接受传统哲学的提问。换句话说,他不是要给出不同的关于传统哲学问题的解答,而是根本拒绝传统哲学的问题本身。但和逻辑实证主义批判传统哲学的方式不同,杜威更多地从考察历史的角度入手,揭示传统哲学的社会学和心理学的根源。如果说逻辑实证主义是用逻辑分析的手法批判传统哲学的话,那么杜威就是用历史 - 社会心理分析的手法批判传统哲学。这种以社会 - 历史的方式批判传统哲学的做法显然更接近于马克思而不是逻辑实证主义。

传统哲学的性质是什么?是揭示实在的真面目?是由于惊异而来的对于世界的知识论的思考?还是出自生活的某种价值需要?杜威从考察人类精神活动的最初目的入手,证明“认识世界”并不是哲学的初衷,相反,生活才是知识的舞台。杜威指出,和人类古老的历史相比,哲学是位很迟才问世的后

来者。在原始初民状态中,人类是没有“认识世界”这一难题的。此时的人类和动物的最大不同在于,人有记忆。他通过记忆保持过去的经验。但最初人类追忆往事并不是为了“正确记实”,他只是为了娱乐,只是为了给当下的生活增加一些趣味。人们只会回忆那些令自己有兴趣的部分。回忆往事并不是为了往事本身。他追想昨日与野兽的搏斗并不是要细细研究那野兽的性质,也不是要改良昨日搏斗的方法,而只不过是想要用昨日的热闹来解决今日的沉闷无聊罢了。因此,杜威指出:“我们可以说,记忆之最初生活是情绪的而非知识的,亦非实用的。”^[1]

这样一种追忆已开始有了一点认识的萌芽,但它并不是为了“反映世界”。它把偶然零碎的事件用回忆之线一段段地串在一起,“当日搏战或赶野兽之时,他们的活动只顾得那一时一刻,是零碎的,直到追叙或演为歌舞之时,那零碎的事实都联系一出有头有尾有起伏有照应的戏剧了。”^[2]原始的人类并不在乎所谓事实的真假。他在回忆中安排舞蹈等,并不以事实的次序为前后,而是根据故事的性质,随意移前搬后。至于这种安排是否正确,他并不在意。

同时,原始人类也会随时随地用自己的感情来解释外在的对象。天上的一片云,可能被看作是一头骆驼或一个人面,他并不在乎眼前这片云与真骆驼或真人面有几分符合。他感兴趣的,是这样一种暗示能满足他的情感需要。杜威由此导出一个结论:“我们须要知道,平常人的平常意识,若没有受过训练,只是欲望的产儿,并非研究考虑的结果。人必须受过一番教练,方才渐渐的不完全是爱憎喜惧的奴隶了。这种教练从‘自然人’的观点看起来,是很不自然的。我们现在的科学与哲学的书自然都是受过很高的训练的人做的;这些人的思想已养成了理性的习惯,他们知道用事实来纠正他们的幻想;他们的思想往往是合于逻辑组织的。他们有时也做点幻想,——这种幻想的时候其实不少,不过人都不肯公然承认罢了——但他们知道这是幻想,是一种顽意见,他们不致把幻想的结果和客观的经验混在一起。”^[3]

杜威认为,实际上,在根本没有受过训练的人那里,理性并不是一种支配的力量,他们的生活主要还是靠记忆的支配,而“他们的记忆并不是追忆实在的事物,只是一种联想,暗示,和幻想。他们只问某种暗示能否刺激感情,能否增长感情,能否加添趣味,能否与此刻的心理相投,能否迎合群众相传的希望与恐惧。”^[4]哲学的原始材料与“科学”和“知识”都没有关系,它只是寓言的,想像的,暗示的,和客观的事实的世界毫不相干。人们可以把它叫作诗歌,戏剧,但它决不是科学,它根本无涉于真理问题。

二、哲学起源于对于安全的需要

这种原始的较为零乱的、满足人的感情需要的材料是怎样变化上升为哲学认识的呢?杜威指出,从动机而言,这种变化是出于人们逃避危险,寻求确定性的需要。随着岁月的流逝,人类的智力更趋发达,他对周围充满偶然、变化的世界不能满足。生、老、病、死、战争、饥馑、瘟疫等旦夕祸灾,以及狩猎无定、气候变易、季节变迁等等,都使人有一种由不确定性而产生的危险感。他要摆脱这种不确定性,为自己找到一种心灵上的慰藉和安静。途径有两种:“一种途径是在开始时试图同他四周决定着他的命运的各种力量进行和解。这种和解的方式有祈祷、

献祭、礼仪和巫祀等。”^[5]但这种方式不久就被废弃了。因为人们后来意识到,奉献一颗忏悔的心灵较之奉献牛羊更能取悦于神旨;虔诚与忠实的内心态度才是最为重要的。宗教由此脱胎而出。

这是一个长时期的历史过程。最初,人们并没有固定的宗教仪式等,他只有偶然的暂时的记忆,他把那些动人情感的经验偶然地抓住,编作故事,或演为哑剧。有些经验发生的频率很高,大家都常常遇到,于是它们就不光是个人的经验而且也成为群体的经验了。其中有几点关系到大家的安危,便被格外地引起注意,条理也渐渐地更完密了,终于,“当年的传奇,变成了社会的遗产;当年的哑戏,变成了宗教的礼仪……当初演串感情上一桩重要经验的戏剧,至此就变成了一种宗教;当初可以自由添减的暗示,至此就变成固定的教条了。”^[6]

“另一种途径就是发明许多艺术,通过它们来利用自然的力量。”杜威这里所谓的“艺术”(arts)是一种广意的概念,它泛指工艺与技术。杜威指出,人通过发明艺术,“从威胁着他的那些条件和力量本身中构成了一座堡垒。他建筑房屋;缝织衣裳;利用火烧,不使为害;并养成共同生活的复杂艺术。”^[7]人们通过行动改变世界,它与前面一种通过在感情和观念上改变自我的途径一起,构成了人们与周围世界相联系的桥梁。然而,从一开始,这种艺术的方式就受到限制和怀疑,人们感觉到这种方式藐视神力,是危险的。因此“一直很少有人预示过,人类可以借助于艺术来控制自然的力量与法则,以建立一个秩序、正义和美丽的王国,而且也很少有人注意到这样的人。”^[8]

人们之所以采取第二种途径可以说是被逼无奈的,它晚于第一种途径。光是信仰礼教并不够,人们决不能只有幻想与暗示,生活的必需使他不得不注意世间的实事。环境的逼迫,有时关系到生死存亡,因此人们不能不注意到一些最基本的事实以及与这些事实相关的艺术。他们固然一方面仍可做着幻想的梦,但另一方面,特别是在日常的工艺技术方面,不能不运用实际的知识。一个水手,他尽管可以把风波看作是神的恶作剧,但他毕竟要熟悉起风时,如何使用船只帆浆的机械的道理,这就是艺术。它随

着人们与周围世界联系的频繁而越来越受到重视。人们享受到了艺术给他们带来的好处并由此发展这些艺术。这样,艺术就与第一种途径发生了一种很不寻常的关系:一个是精神的慰藉,一个是日用的操作,有时融洽相处,有时冲突,各立门户。这种关系后来演变成为理论与实践的关系以及哲学与科学的关系。总的来说,前者一直凌驾于后者之上。

三、哲学继承了宗教的趣味

对于上述现象,杜威从两方面加以解释。一方面,寻求确定性是抬高精神信仰,贬低艺术的主要原因。艺术是一种外在的行动,它是与外在世界的一种实在的接触。因此,它不仅取决于我们人类,更重要的还取决于自然界,取决于命运。这样,它便有一个内在的不能排除的显著特征,那就是与它俱在的不确定性。正像杜威所说的:“行动,但须冒着危险行动。关于所作行动的判断和信仰都不能超过不确定的概率。”^[9]实践活动所涉及的乃是一些个别的和独特的境况,而这些境况永远不可能确切的重复,因此对它们也不可能完全加以确定。艺术帮助我们考察各种情况,尽量做出最明智的选择,我们据此采取行动,除此之外,其他只能依赖于命运。艺术不能使人真正摆脱不确定性的危险。于是,人们便更加推崇那富于诗意的带有宗教意味的信仰。这是一种精神上的、内心的安慰,它可以无所不包,无往不在。它使人们能够不依靠于行动而给人们带来幸福,“这种幸福是完全的,不致陷于外表动作所不能逃避的危险。”^[10]依照传统的主张,理智可以抓住普遍的实有,而这普遍的实有是固定不变的。人们向往这个境界,因为“在这个境界里有一种不表现出来而且没有外在后果的活动。人们之所以喜爱认知甚于喜爱动作,‘安全第一’起了巨大的作用。”^[11]由于人们在内心的精神世界中更能找到那支撑偶然世界的支点,他便宁愿相信宗教、相信内在的精神追求,而对行动、实践以及与此相关的艺术抱一种不信任甚至是贬低的态度。另一方面,这种态度又由于社会阶级的分化而得到了加强。劳作从来就是繁重的、辛苦的,它自古以来就受到诅咒。它是人们被迫的行为;而理智则和闲暇连在一起。亚里士多德曾说:“这类学术研究的开始,都在人生的必需品以及使人

快乐安适的种种事物几乎全都获得了之后。”他并且说:“这类学术不是一门制造学术。”^[12]杜威指出,由于实践活动是不愉快的,人们便尽量把劳动放在奴隶和农奴身上。社会鄙视这个阶级,因而也鄙视这个阶级所做的工作。

在所有的早期文化中,人们都通过这样两种途径去寻求安全,而且又几乎无例外地,总是抬高宗教的途径,贬低艺术的途径。人们一方面控制日常事物,另一方面又依赖于某种优越的精神力量。哲学反映了这种区别并固定了这种区别。它继承了宗教的趣味,贬低艺术的趣味。它继承了宗教所涉及的境界,它的认知方式之所以不同于经验艺术的认知方式,正在于它所涉及的是一个高级实有的领域。它将世界分为两个部分。一个大约相当于普通民众在信仰里所涉及的那个宗教的、超自然的世界。这个世界,经过了哲学的形而上学的翻译,就成了一个最高最后的实在的世界。在社会中,一切重要的真理和规则的最后根据,全靠那些最尊贵最神圣的宗教信仰;同样的,在哲学方面,那个绝对无上的实在也就成了关于事物的一切真理之最后的保证。这个“本体的世界”,只有经过了哲学上的系统训练才可看得到。一般人所能认识的只是平常的经验的现象的世界”。它是我们的日常世界,是艺术和事实的世界,是一个不完全的、不能永久的世界。

杜威认为,哲学和宗教在形式上的最大不同也就是语言上的不同。哲学因为要担负起为往日全凭感情的契合和社会尊崇的东西作辩护,它就不能再用想象和情绪的方式,而只能采用逻辑的理性论辩的方式。杜威指出,哲学的这种讲求论辩逻辑的方式和它要辩护的对象是分不开的。讨论事实的时候,不需要精巧的逻辑,简单笨拙的证明就够了,——只要合乎事实,指给人看就够了。这是一切论证的最基本的形式。只有在亚里士多德称之为“第一哲学”的事业里,只有把哲学看作是一桩冷静理性的、客观旁观的、涉及到事实所不能达到的领域的事业里,只有认为哲学高于艺术,哲学只关心事物的形式即普遍必然的真理时,哲学家们才会把逻辑论辩作为自己的主要工具。“凡抽象的定义与超科学的辩证,就是这样起来的;起来之后,有许多人从

此不敢来叩哲学的门了,然而哲学的信徒却在这里面寻着无限的趣味。”^[13]

这样,哲学便彻底地脱离了它的最初的源头而以一种冷峻的探索必然真理的面目出现了。它显得崇高威严,只在自由的世界中施展才能,对经验的世界则不屑一顾。对与这个世界相关联的工艺技术活动更是嗤之以鼻。它运用着严格的推理方式,以压倒一切人的力量迫使人们不能不相信它指给他们的世界。这是一个本质的世界,一个没有哲学的素养便无从谈论的世界。然而杜威警告我们,哲学的这一要求其实是虚妄的,它实际上折射了人们的某种情感上的满足,某种人生的价值,某种对传统信仰的维护。它是保守的,面对过去的;而且,它把世界划分为两个部分,更是生出了无穷无尽的麻烦。哲学改造的任务,就是要削除这种割裂世界、割裂知行的作法。

四、培根与达尔文对哲学的影响

哲学改造的武器来自近代科学。杜威将培根当作哲学改造的先驱者,因为正是培根创立了一种新的科学精神。培根对于新世界观的形成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西方哲学传统自古希腊以来,一直将经验世界贬为不真实的实在世界的幻象,哲学一直专注于经验世界背后那不变的永恒世界;逻辑的演绎、概念的思辨是把握永恒世界的唯一方式,归纳、观察只适用于经验世界,只能为人们带来意见或表象。是培根将这种哲学翻了个个。传统思辨哲学的虚幻,在培根的揭露、嘲讽下,显得那样的苍白无力。哲学不必惧怕经验,相反哲学应该拥抱经验,拒绝思辨。没有这种大胆的突破,就没有近代经验主义、科学精神的昌盛,也没有实用主义、实证主义等等哲学新潮的涌现。因此,杜威将培根作为近代哲学也是实用主义哲学的英雄,不是没有道理的。

而更值得一提的,对于杜威的哲学改造来说也更加重要的,是另一位科学家达尔文。如果说培根用原先被贬的经验世界,以及人们与这个世界打交道的实验行为,替代了传统哲学的形而上学以及与之相关的思辨方法,作为人们思考的重心,那么达尔文正是在这个基础上更进一步,将人置于这个经验世界之中,考察人与自然界的关系,考察物种在与环

境交互作用中的进化原理。这个思想对杜威的影响是决定性的。培根的思想造就了近代经验主义,而达尔文的思想则直接和实用主义的滥觞密切相关。这主要体现在两组重要概念上:

首先是“物种”“起源”的概念。1909年杜威发表“达尔文主义对哲学的影响”。在这篇著名的论文中,杜威指出,“起源”和“物种”的概念表明了一种理智的反叛。因为“物种”一词来自于希腊,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用它来指那种固定的作为知识的真正对象的实在。一旦物种本身也被带进了变化的世界,人们就没有理由认为“固定”、“最终”具有一种更高的地位,变化和起源也不再被认为是具有缺陷的非实在性的标志了。变化而非永恒才是实在性的检验标准;关注的焦点应由绝对的起源和世界本身转向特殊、多样化的具体的经验世界;必须以自然主义的实验方法来代替传统的超自然的世界观;知识是感性有机体与环境交互作用的产物而不是认识主体去追求那作为对象的异在世界的摹本;真理不再具有永恒的特征,它是一种有力的工具而不是供人观赏的展品;应该把一些传统的哲学问题放在一边而转向具体的、现实的人的问题。这篇文章所传达出的所有这些思想已不只是对达尔文进化论的介绍了,它无疑预示着一新哲学的诞生。这种新哲学强调变化、多样、异质和特殊。两千多年来,哲学强调固定、“最终”的至高无上,达尔文进化论使人们醒悟过来:它们并不是完美的象征而是衰败死亡的征兆。因此,在杜威看来,自然界是“变化的不确定的聚集体”,探究的方法不是将事物与固定不变的东西相关联,而是追寻变化的类型,“断然放弃寻找绝对起源和绝对终极以便找到导致它们的特殊价值和条件”。^[14]

其次是“有机体”的概念。这里包含了两层意思:人和其他有机体是连续的;人和环境是交互作用、有机统一的。在达尔文看来,人作为有机体的更高表现形式是由更简单的有机体进化演变而来的,人是在与环境的交互作用中进化的。杜威由此意识到,人并没有高于其他有机体的特权从而把自己置于世界之外,人的意识不过是动物适应环境方式的延伸:“生理的有机体及其结构,无论在人类或在低

级动物中,是与适应和利用材料以维护生命过程有关的,这一点是不能否认的。大脑和神经系统基本上是行动与经历的器官。^[15]我们是生活在世界之中的,我们和其他有机体一样,是这个世界之中的成员。于此相关,我们和世界不是割裂的,而是有机统一的,我们在世界之中,世界也在我们之中,我们和世界的交互作用既促成了我们的进化演变,也促成了世界的变化;不能把我们的概念思考看作世界之外的加于世界之上的东西,它们是世界之中的,是人与环境交互作用中自然形成的。“活的生命的事业和命运都依赖于它与环境之间的相互交换,这种交换关系不是外在的,而是亲密的。”^[16]这种世界观否定了原先设作哲学前提的二元分割。实用主义正是在这一新的基础上形成了自己的哲学观点,在哲学的任务,哲学的性质等等的看法上,产生了巨大的革命性的转变。

五、杜威与孔德的同和异

杜威所处的时代正是科学一路高歌的时代,进化的思想深入人心。这里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杜威关于哲学起源和哲学改造的分析与实证主义的创始人孔德的知识进化思想十分接近。孔德将人类知识的演化进程分为三个阶段,即神学阶段、形而上学阶段和实证科学阶段。在神学阶段,人类通过宗教的眼睛看世界,人与神同形同性,由此获得和谐;情感和想象而不是理智与观察,是人们精神活动的主要方式。在形而上学阶段,抽象的思辨代替了情感和想象,思考代替了祈祷,但此时的思考和经验观察没有关系,一切都在先验领域中进行。形而上学是宗教的哲学形态。“神学和形而上学都相信,取得绝对的知识解释事物的内在本质是可能的。”^[17]只是到了科学的阶段,人们才不再依赖于先验概念,而是专注于经验现象,专注于感觉的世界;通过观察,构造假设,再以观察检验假设,知识只能是实证的知识。显然,孔德的这套知识演化学说和杜威关于“哲学改造”的阐述在思路十分相近:人类对于世界的认识方式,最初是情感和想象,然后是先验的思辨,最后是经验观察。知识由寻找不变的本质,让位于实践的目的。

乍看起来,杜威确实和孔德以及大多数科学史

家对于科学演变的认识是一致的。但如果仔细分析杜威的学说,我们就会看到,他对科学的认识其实和孔德还是有着精细的差别。孔德是位实证主义者,他所谓的经验观察是近代实证科学意义上的,是近代经验主义所说的感觉观念。而杜威所谓的经验有着与此不尽相同的含义。当他说经验观察取代先验思辨,成为近代科学从而也应该成为新哲学的出发点时,听起来和实证主义的腔调确实十分接近,所以,柯亨对于杜威的指责似乎不无道理。不过我们应该注意,受达尔文的影响,杜威要破除一切二元分割,包括经验与先验,观察与推理的二元分割,经验本身是一个渗透了理解、信念的整体,这一思想恰恰又是和库恩的主张相近的。因此,关键是要明白,杜威的经验到底是怎么回事。

六、经验是生活的同义词

杜威对经验的描述完全不同。他不是将经验建立在近代物理学模式上,而是将经验建立在十九世纪达尔文生物学基础上的。人不是在世界之外,而是在世界之中的。人不是世界的旁观者,而是和世界融为一体的属于世界的一部分。经验不是认识的一环,而是在世界中的“做事情”,是“一种行动的事件。”杜威就此反复指出:“如果生物学的发展能被接受的话,那么经验的主题就至少是动物的,和其他有机体形式在一个更加复杂过程中的连续性。……不能把经验等同于大脑的活动,它是在所有与环境——自然的和社会的——交互作用中的整个有机的施力与忍耐。大脑首先是某种行为的器官,不是认识世界的器官。再重复一遍,经验只是与自然事物相互作用、相互关联的某种模式,有机体碰巧也是这些自然事物中的一个。由此同样有说服力地推出,经验首先不意味着知识,而是意味着做和经历。”^[18]“经验是有机体自身和世界之间持续累积的交互作用的产品,或也可以说是副产品。”^[19]“凡有生命的地方,即有行为,活动。要要生命继续,这个活动一定要连续不断并且要适应于环境。……请注意这个观点在传统的对经验之观念起了怎样的变化。经验成了主要是行为的事情。生机体并非停着不动,像米叩伯似的(Micawber-like)老是等有东西出现。它并不被动地懈怠地等东西由外边给他以印象。”^[20]

我们可以举个简单的例子来说明杜威的经验概念:当我们说我们有关于某个城市的经验时,我们想要说的是什么呢?是不是想说我们看了很多很多关于这个城市的图片或电影?或者是不是作为游客观光了这个城市的许多地方?近代哲学家们把经验看作心灵内部关于世界的表象,就像一个人坐在密封的影院内观看关于世界的电影。就算这电影和现实等同,也不过像是一个观光客对世界有着很多的印象。而我们知道无论我们看多少这样的电影,逛多少城市的美景,我们还是不能说自己就有了关于这个城市的经验。按照杜威的观点,相比之下,只有那些生活于这个城市,与这个城市相互交换,将自己融入这个城市中的人才更有资格说自己具有关于这个城市的经验。也许他甚至不如电影观众或城市旅游者看的地方多,但我们仍然会说,他比他们对这个城市更具有经验。这里用“他具有经验”都不是很合适的,因为经验不在他心灵中,而在他与城市的交互作用中。他和这城市生活在一起,城市对于他是环境,他在前反思的状态下与他的环境融为一体。经验在这里和生活是同类语。一切都在流动中,一切都在施动-受动的转换中。所以杜威又说:“‘经验’是一个詹姆斯所谓具有两套意义的字眼。好象它的同类语生活和历史一样,它不仅包括人们做些什么和遭遇些什么,他们追求些什么,爱些什么,相信和坚持些什么,而且也包括人们是怎样活动和怎样受到反响的,他们怎样操作和遭遇,他们怎样渴望和享受,以及他们观看信仰和想像的方式——简言之,能经验的过程。‘经验’指开垦过的土地,种下的种籽,收获的成果以及日夜、春秋、干湿、冷热等等变化,这些为人们所观察、畏惧、渴望的东西;它也指这个种植和收割、工作和欣快、希望、畏惧、计划、求助于魔术与化学,垂头丧气或欢欣鼓舞的人。它之所以是具有‘两套意义’的,这是由于它在其基本的统一之中不承认在动作与材料,主观与客观之间有何区别,但认为在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中包括着它们两个方面。”^[21]

这种经验概念强调的是经验的原初状态。我们是和环境相互作用的,这是我们有机体的第一前提。

我们并不是先认识对象,而是先占有、享有对象的。经验首先应该是这种占有、享有并与对象彼此不可分,因而它必定一开始是相对模糊的、混沌未开的,相比之下,只是因为有了一个旁观者,经验才开始被处理为清楚的概念。

“哲学的改造”是杜威一部重要哲学著作的名字,也是实用主义的中心话题,“这一概念贯穿了杜威的整个工作,因而成为理解他的哲学的必要因素。”^[22]杜威对于传统哲学的批判为我们理解传统哲学开辟了一个新的视窗,使我们看到了哲学与生活的密切关联。哲学起于生活,当回归生活,这或许是杜威带给我们最深刻的启示。

注:

[1][2][3][4][6][13][20]杜威:《哲学的改造》,安徽教育出版社,1999年,第16页、第2页、第2-3页、第4页、第5页、第6页、第13页、第19页、第54-55页。

[5][7][8][9][10][11]杜威:《确定性的寻求》,载于《资产阶级哲学资料选辑》(第九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56年,第1页、第1页、第1页、第3页、第4页、第4页。

[12]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商务印书馆,1981年,第5页。

[14]J. Dewey: *Essays on Pragmatism and Truth* (1907 - 1909), Southern Illinois University Press, 1977, p. 10.

[15][23]杜威:《经验与自然》,商务印书馆,1960年,第22页、第10页。

[16]The Late Works of John Dewey, 1925 - 1953, ed. J. A. Boydston, Southern Illinois University Press, 1981 - 1990. Vol. 10, p. 19. 中译文转自罗伯特·塔利斯:《杜威》,中华书局,2002年,第24页。

[17]梯利:《西方哲学史》,商务印书馆,1995年,第554页。

[18]J. Dewey: "The Need for a Recovery of Philosophy", in *On Experience, Nature, and Freedom: Representative Selections*, ed. R. J. Bernstein, New York: Bobbs - Merrill, 1960, p. 45. See C. West: *The American Evasion of Philosophy*, pp. 88 - 9.

[19]The Late Works of John Dewey, 1925 - 1953, Southern Illinois University Press, 1981 - 1991, vol. 10, p. 224.

[21]罗伯特·塔利斯:《杜威》,第19页。

(责任编辑:金宁)